

观察当前国际危机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几个视角

陶 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

关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国际体系转型”，我认为还可以有以下几个观察角度。

一是从各国相继出台的反危机具体措施及其力度，观察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影响。之所以要用这种“倒推”的方式，原因之一是次贷危机一步一步恶化扩散，美国金融界和监管当局却在不停地“捂盖子”。国际市场信心崩溃正是源于一次又一次的受骗上当，源于对金融“未爆弹”及其巨大杀伤力的担心和恐惧。虽然人们(可能还包括监管者自己)至今仍无法也无力了解那些超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但随着著名银行和巨型跨国企业陷入绝境乃至倒闭，个别国家面临破产，大家已能感觉到这座浮在水面的冰山有多可怕。相关国家交出不菲学费之后，对危机的理解终于变得深刻和全面了。

当前世界面对的是一次复合型危机。它从虚拟经济蔓延至实体经济，波及社会和政治等各个领域。抗衰退、反危机、保增长，各国不同的做法、侧重点和力度，反映了各自的问题所在和严重程度。所有这些应对措施不断加码出台，本身就是答案，让我们得以“动态地”理解这是一场怎样的危机。尤其在金融风暴的中心，政府采取的对策力度空前，英美等国不惜动用了国有化、“限薪令”这样的“非常规”(美国学者戏称为“美国特色社会主义”)措施，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把这场危机的本质看得更清晰、透彻。自由资本主义的典范出的毛病，要靠社会主义药方来治，总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病急乱投医”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反危机措施本身往往蕴含着新危机的祸根。故此，还要密切观察这些反危机手段如何收场退出，所产生的理论和政策歧异如何自圆其说，对危机的肇始地美国和转嫁危机的工具美元，又何以重拾信心？至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有一点已经看得清楚，就是美国赖以对抗这场严重危机的利器——疯狂运转的印钞机，不只会销蚀世界的财富和美国模式的光环，也无疑会成为国际体系

转型的催生剂。

二是从危机逐步展开和恶化之中各国或国家集团所暴露出来的弱点，观察国际力量消长与互动的步伐与方向。迄今出现和存在多种多样的国家间伙伴关系、战略关系等，对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发展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因为众多的、层出不穷的“关系”而忽视各种力量的不同性质。力量的性质才是决定性的。

冷战结束后，美苏(俄)两个超级大国在力量结构完整性和全面性(综合实力)方面的差距得以显现，而这一差距在冷战时期被军事对峙所掩盖，被结盟对立所弥补。“一超多强”定格并延续至今，其间，传统力量中心各有变化，新兴力量崛起势头迅猛，但“一超”与“多强”之间在力量均衡性上的差距仍大。冷战后时代乃至 21 世纪初的国际秩序变化，深深地受制于此。从这层意义上看，21 世纪国际秩序仍是 20 世纪国际秩序的延续。在分析未来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时，应该先看看“一超”的力量均衡性有没有削弱，“多强”力量的非均衡性得到多少改观以及这种努力所受的结构约束是否依然存在。

对于国家间的竞争，在繁荣时期，是各国发展能力的大排队、大比拚；在危机时期，则是各自生存和适应能力的大排队、大比拚。在眼下这场被称为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中，不光是“一超”的弱点充分暴露，“多强”们的缺陷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展现甚至放大。危机尚未结束，聚光灯下的选秀刚开场，选手们的瑕疵却已经被“晒”了一遍。看来，主要国际力量都面临补强自己的压力。危机之中，保持经济优势和活力是第一位的，毕竟经济力量是基石。可以说，旧秩序的演进和新秩序的建构，同时是各股力量自我补强的过程。理解这一“补强”的特点，有助于把握国际秩序的变化方向和进程。正因为各有各的难处，都有“借力”的需要，包括借别国的力量、借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的力量。

在伦敦金融峰会上,这一点表现得较为明显。

三是从危机中主要力量的行为方式变化和心态调整,看国际体系变化的条件和环境。四月初的伦敦峰会,展现了这些占世界经济总量 3/4 的经济体对全球困境的认识、应对的能力和意愿。在危机中,它们不仅进一步看清自身的弱点,还认识到全球化时代维护自身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变化。套用一句米尔斯海默的话,它们清楚自己的外部环境,并从战略高度考虑自己的生存之道。MF 等国际机构获得巨额注资,各国间彼此伸出援手,“‘9·11’式的求助困境”未再大规模重演,“无助的恐惧感”得到有效的遏制。自助、互助、共助,体现出值得肯定的全球化时代“大国的理性”。

自危机爆发以来,国家间、地区间和国际层面的合作不断,国际金融合作、经济政策协调的广度与深度空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同舟共济”气氛。能出现这样的喜人局面,形成共同对抗危机的合力,说明相关国家较过去更好地处理了利己与利他、本国利益与世界整体利益的关系。“同舟共济”意识变浓,证明饱受争议的全球化在这场危机中得到了检验、经受了考验。这也正是时下保护主义在来势汹汹的同时,又受到强大抵制的原因。

面对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最大的挑战,各应战方将会被激发出怎样的力量,这不仅关系到应战方自身,也将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变化。危机既提供了国际秩序变化和大国关系重组、寻找自己适当位置的动力,又产生了利益拓展、调整和战略制衡的摩擦力。正因为如此,这场大危机中各主要力量的行为方式和心态变化调整,对于判断今后走向十分重要,是国际体系转型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

四是从长远应对危机的客观要求,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使命和作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再次证明,这个世界的确需要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像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的旧制度早已难以为继,但旧的规则,你不推它,它就不倒,更何况你连说都不去说它。此次中俄等国公开倡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砖四国”在会前协调立场、高调公布,从以往的小声嘀咕到如今的大声直言,可谓迈出了历史

的一大步。可以肯定的是,谁也无法指望危机过后现有秩序一切重归原点。从发达与发展中行为体的关系看,过去那种“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的区别正在改变,发展中国家关于和谐世界和国际新秩序的观点,关于国际体系改革的倡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倾听与尊重,在国际体系中发言权和影响力增大的趋势不可逆转。这场源自发达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给予发展中国家发声的机会,赋予它们参与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使命与责任。坚定表达自己的主张,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并果断地使用力量,发挥能动性来主动塑造国际新秩序的任务,客观地摆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前。

关于新秩序的设想和讨论其实已孕育有年,只不过由这场危机呼唤而出,势头更猛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的变化有其轨迹可寻,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步伐加快,是可以预见和期待的。正因为国际秩序处在动荡、变化、转型之中,过去对相关行为体要么是“破坏者”、要么是“维护者”的二分法,已然过时。现如今,每一个行为体都是“参与者”,或许有消极和积极之分。顺应国际秩序变革的大潮流,就是积极的,反之就是消极的。

重构秩序,修改规则,分享权利,牵一发、动全身。美国在这次峰会前后,表明了维护国际规则主导权、维护美元霸权的坚定立场,说明虽然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地位某种承认,对发展中国家利益做出某些妥协,但其维护既得利益的原则不会轻易让步。危机时,有话好说,危机过后,有话慢慢说,最后还要凭实力说话。基于对自身弱点、对国际现实政治本质、对秩序规则变动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发展中国家要真正实现从过去的“被动顺应”转变到现在“积极参与、主动塑造”,难度很大。量力而行,趋利避害仍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原则。但有一点应该承认,在国际秩序转型的复杂过程中,不论怎样做,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避开所有的“害”,也不可能得到所有的“利”。既然国际秩序转型的方向总体是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就应该认清形势,把握时机,坚定信心,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创造更大的挥洒空间。

○